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三 | 醫療與國家

克爾·瓦丁頓——著

KEIR WADDINGTON

李尚仁——譯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三 | 醫療與國家

克爾·瓦丁頓——著

KEIR WADDINGTON

李尚仁——譯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左岸歷史 212

歐洲醫療 五百年

卷三 | 醫療與國家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作 者 克爾·瓦丁頓 (Keir Waddington)

譯 者 李尚仁

總 編 輯 黃秀如

責任編輯 林巧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 108-2 號 9 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2218-8057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 - M a i l service@bookrep.com.tw

網 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14 年 8 月

初版二刷 2014 年 11 月

定 價 300 元

I S B N 978-986-5727-10-9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三·醫療與國家／

克爾·瓦丁頓 (Keir Waddington) 著；李尚仁譯。

一初版。一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4.08 (左岸歷史：212)

譯自：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ISBN 978-986-5727-10-9

1.醫學史 2.歐洲

410.94 103012962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by Keir Waddington.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Medicine by Keir Waddington
Copyright © 2011 Keir Waddington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CONTENTS

目次

CHAPTER 12

公共衛生.....5

Public Health

CHAPTER 13

健康照護與國家.....51

Healthcare and the State

CHAPTER 14

醫療與帝國.....95

Medicine and Empire

CHAPTER 15

醫療與戰爭.....133

Medicine and Warfare

CHAPTER 16

精神病院的興起.....171

The Rise of the Asylum

後記.....217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三 | 醫療與國家

克爾·瓦丁頓——著

KEIR WADDINGTON

李尚仁——譯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目次CONTENTS

目次

CHAPTER 12

公共衛生.....5

Public Health

CHAPTER 13

健康照護與國家.....51

Healthcare and the State

CHAPTER 14

醫療與帝國.....95

Medicine and Empire

CHAPTER 15

醫療與戰爭.....133

Medicine and Warfare

CHAPTER 16

精神病院的興起.....171

The Rise of the Asylum

後記.....217

CHAPTER 12

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



社會健康史一直把焦點放在國家的作為，或是國家保護、促進社區與人群健康的努力。當歷史學者不再認為衛生改革是必然發生且必然有益之事，也不再認為它們是回應都市化與疫病的壯舉，「公共衛生」一詞有了各種不同的用法，它可指涉運動、行政組織、醫學學科或是政治觀念。歷史學者對公共衛生的大事記看法沒有太大改變，基本上是由近現代時期的傳染病控制，轉變到十九世紀的改良物質環境，最後是二十世紀「治療型國家」(therapeutic state)的發展；然而，公共衛生受到更廣泛的全國政治、地方政治以及社會經濟條件所形塑，考察之下揭露出更為複雜的過程。對疫病的反應，常讓當局得以實施一系列針對市民的規定，其用意不僅在於預防疾病，亦是要控制窮人。這揭示了公共衛生具有重要的政治面，可是公共衛生的政治面卻無法直接對應到威權或自由的政治文化。歷史學者檢視對瘟疫的反應或十九世紀衛生改革，以此考察公共衛生降低死亡率的功效，進而看出多樣性、地域主義乃至政策、官員和地方政治經濟資源等因素如何影響公共衛生措施。探討這些領域再進而思考比較，就會發現公共衛生改革不是自然或線性的過程。國族文化亦不可忽視：例如，十九世紀不同歐洲國家對細菌學的反應就有重大差異。專注於

脈絡與比較，並不是要淡化公共衛生意識形態上和操作上的改變，所涉及到的規訓文化（disciplinary culture）的出現。社會關係的醫療化以及身體日益受到各種國家單位監控，反映的是現代官僚國家的成長。這樣的研究取向鼓勵我們檢視以下因素如何塑造公共衛生：對傳染病傳播方式的看法、對國家角色的不同想法、改革的文化脈絡與知識脈絡、專業與慈善機構的作為，以及地方脈絡。本章將探討上述這些領域。

◆ 瘟疫與近現代國家 ◆

近現代公共衛生的性質，和對瘟疫的回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檢視後者會是理解前者的絕佳起點。這點不該讓人感到意外，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瘟疫殺死了近現代歐洲相當可觀的人口，激起區域與地方的種種反應，成為近現代時期控制流行病傳播與衝擊的主要作為。

要採取怎樣的方法來預防瘟疫，有賴於當時對疾病因果關係（或是病因學）的理解。瘟疫在某種層次上被解釋為上帝不悅的徵象，或證實了道德與身體的不潔淨。應該做的是祈禱和懺悔，其象徵與儀式的功能可以凝聚社群，對於那些被認為是不道德、汙染而要為瘟疫負起部分責任之行為，也有勸阻的效果。因

此，城鎮組織遊行和宗教儀式來遏止疾病傳播；瘟疫結束時則舉辦祈禱或興建教堂來表示感激。在另一個層面，瘟疫在十四世紀的重新出現，挑戰了當時依據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之著作的疾病因果概念。希波克拉底著作認為疾病和環境狀況有關，並將瘟疫歸因於腐敗的植物、排泄物、屍體等所產生的不良空氣（或瘴氣），以及個人體液的不平衡。雖然這些觀念未被放棄，但瘟疫卻讓人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傳染。對瘟疫傳播方式的理解，促成一套以隔離為主的措施。不同作法之間有其緊張關係，例如在1630年，教宗厄爾班八世（Urban VIII）就因為有人抱怨佛羅倫斯的衛生官員干涉宗教遊行與儀式，而將這些官員開除教籍。然而，宗教、區域和地方當局基本上都是在上述大架構之下進行干預。

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城邦首先引進限制病人與健康者接觸的措施。這些措施通常和醫學的關係不大。當城外爆發瘟疫時，城門會關起並要求旅人出示健康證明。在這個小國林立的時代，此一排除政策相當簡單直接。瘟疫降臨時，病人（通常包括家屬）被隔離在家中或遷移到疫病院（[lazarettos]一座醫院或是隔離站），以煙燻消毒房屋並燒掉病人衣物。義大利大多數主要城市逐漸建立起常設的衛生局，例如佛羅倫斯是在1527年設立。這代表了首度嘗試有系統地監控

和保護公共衛生。這些衛生局不只實施檢疫制度與隔離病人，同時也設法消除被認為會滋生疾病的不衛生狀況。雖然衛生局會諮詢醫師意見，但它基本上是個政治組織。

隨著傳染病的起伏，歐洲的地區當局發展出因應瘟疫的常規做法。對公民而言，傳染病的緊急狀態使得國家可以施行一系列管制。由於疾病被認為和貧窮有關，因此國家開始實施杜絕賭博和乞討的控制措施。在義大利模式的影響下，病人受到隔離，死者獲得死亡證明。當局開始管控死者埋葬，並建立隔離醫院。暫停市集等正常活動，區域間的貿易則受到限制。死亡公告或死亡手冊的印行，使得地方社區能夠評估威脅的嚴重程度，並得以知悉相關的預防措施。當局任命各種官員，包括瘟疫醫師、沒有醫學背景但負責篩檢病人的檢疫者，乃至負責埋葬死者的墳墓工人。

民政和醫療當局根據接觸感染的觀念採取應對措施。他們採取因應疫病的預防措施；等到出現瘟疫病例的報告便建立隔離病院、檢疫措施和衛生警戒線（cordons sanitaires），以防止受到感染的船隻或個人傳播疾病。這些控制措施不見得都很嚴謹，但這並非知識不足所造成，而是視情況嚴重程度而定，也反映了擔心瘟疫管制可能擾亂城市或地區的生活。檢疫的歷史

都是在成功與失敗之間擺盪，十八世紀的馬爾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逐漸地，檢疫制度變得更有組織和更嚴厲，並獲益於國際間的情報交換以及更為嚴格的政府管制。例如，當瘟疫在1720年抵達馬賽時，政府就設立衛生警戒線，任何擅自出入城市者都可處以死刑。直到十九世紀，檢疫措施和衛生警戒線都是遏止流行病傳播的機制。

這些做法並非一成不變，預防和管制隨時間而演變，而且都是在危機時期所採取的臨時措施。法國和俄國在十六世紀初期就引進了對抗瘟疫的法令，但是那不勒斯和瑞士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前，對疫病的管理則相當鬆散。地方層次的管控措施是在嘗試錯誤的基礎上實施。實用的政策是漸進形成的。然而，對瘟疫的控制不見得都有效：在瘟疫最嚴重的貧窮區域，財政不足阻礙了這些措施的實施；而負責治療或埋葬瘟疫受害者的官員則很難招募。這些措施也曾受到批評，英國對隔離措施的價值發生爭論，而更常見的狀況是，瘟疫管控激起了官民衝突。十六世紀西班牙和法國的證據顯示，擾亂經濟與社會體制的不是瘟疫，而是對瘟疫的反應，也正是對瘟疫的措施激起了反對。儘管有這些問題，隔離和照顧病人的工作仍成為地方政府固定的職掌。

瘟疫的死亡率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下降。此一現象的原因引起歷史學者的辯論〔參見〈疾病〉〕，但相關研究逐漸支持這是公共衛生規劃所帶來的成果。檢疫措施確實限制了老鼠和人的散佈，因而減少了瘟疫的傳播，而歷史學者也認為，哈布斯堡王朝為了1708-13年的瘟疫流行，沿著奧匈帝國的南部邊界建立衛生警戒線，以及普魯士在1770年所設立的衛生警戒線，都提供西歐有效的防堵。但這並不表示實施的檢疫措施很完善。它們並不完美。不可能阻止每艘帶有瘟疫的船隻或每個感染者，而衛生當局考量到城市與區域的運作，也會在認為不致影響健康的情況下放鬆管制措施。然而，由於瘟疫的傳播相當偶然，因此即使不完美而有漏洞的檢疫措施，仍舊能夠減少感染的機會。

◆ 醫學警察和公共衛生：1600-1800 ◆

正如第二章所指出，傳統說法認為死亡率下降和實質經濟成長有關，但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的工業化卻導致了混亂、貧窮與疾病。因此，工業化和都市化起初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死亡率的突然升高，特別是傳染病引起的死亡。各國的社會經濟變遷模式不一：法國的工業化過程是漸進的；而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俄羅斯幾乎沒有工業化的痕跡。然

而在十八世紀，由於都市的基礎建設超過負載，許多城市充斥著人群和污穢，工業和貿易的擴張則污染了環境，並有助於疾病散播。許多城鎮努力擴張而無法因應這樣的狀況。城市的街道覆蓋著穢物和排泄物，塞納河和流經羅馬的台伯河等河流則比開敞式的排水溝好不到哪裡去。雖然死亡模式依各地的環境而定，但傷寒與類傷寒等地方風土病以及夏季的腹瀉疾病，在這樣的環境中猖獗；天花、流行性感冒、痢疾、白喉與其他的流行傳染病，傳播快速且殺人眾多。雖然瘟疫的嚴重程度降低了，但這些疾病與流行病填補了空缺。面對這樣的環境，當時的評論者幾乎用盡了所有的言詞，來形容都會衛生狀況的恐怖。地方當局常被問題的嚴重程度所癱瘓，但歐洲國家對人口的健康越來越感興趣。

歷史學者經常借助「醫學警察」的觀念，來解釋十八世紀國家角色的日益擴充，並採行以公共衛生和醫療管控為重點的措施，來回應都會悲慘的狀況與滿足人群的健康需求。一般認為此一觀念出自奧地利醫師約翰·彼得·法蘭克（Johann Peter Frank），其六大冊的著作《完整的醫學警察系統》（*System einer Vollständigen Medicinischen Polizey*）之第一冊在1779年出版。法蘭克指涉的不是現代意義下的警察，而是國家的管理。法蘭克的《醫學警察》勾勒出管制致病行為的辦法，並提